

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反思与突破^{*}

李军全

【提要】 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展现兴盛状态,颇具影响力。不过,囿于纪念日政治性的理论预设,中共纪念史研究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隐隐地流露出某些欠缺,似乎陷入了注重呈现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时间的政治性一面而低估其作为民众时间的社会性一面的研究困境。因而,发掘中共纪念史中的社会时间,分析纪念日从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向民众社会时间转化的路径、形式和状态,将是一条缓解研究困境的有效路径。这条路径的优势在于,在发掘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日组织开展社会建设的政治思虑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呈现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的思想认知、态度情感和行动反应,还原党、政府、民众和社会力量在纪念日中相互扶持和角力的历史本真,真正地把社会环境带进中共纪念史研究中,从而实现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知识重构”。

【关键词】 时间 社会时间 纪念日 中共纪念史

时间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既有属于精英的政治时间,又有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也不断发生着从政治时间向社会时间的转化。纪念日作为纪念与缅怀事件或人物的时间符号,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本质属性。伴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纪念日愈益“将政治和社会时间串联起来,赋予社会生活一副骨架”,^①逐渐形成了颇具声望的纪念日史。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成长为学术研究热点,探究纪念日对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功用日益受到学者们的注意。所谓中共纪念史,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历史”,^②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层面的政治行为和目标意图,又包括社会层面民众对于纪念活动的态度情感和行动表达。也就是说,在中共纪念史中,纪念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展演自身理念和形象的政治时间,还是社会民众体悟、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各项事业的社会时间,这两者并非冲突、对抗的关系,而是不断地转化与融合,共存于纪念时刻,一起诠释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的有效性。

目前,中共纪念史研究主要强调纪念日的政治性,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时间,大体表现为两种描述:一种是对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本身的研究,基本限于纪念活动的场景描述,涉及纪念原因、纪念形式、纪念过程诸问题;另一种是对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的研究,聚焦纪念活动蕴含的政治意义、组织建设和时代价值,更多讨论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追求任务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这样的描述不仅勾勒出中共纪念史的主题主线,还在很大程度上评估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的效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这毕竟只是一个面相,中共纪念史倘要完整的面貌呈现和更有说服力的纪念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节庆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BDJ063)的阶段性成果。

① 薛云、李军全《时间政治:中共革命纪念日体系的生成与演化(1921—1949)》,《南开史学》2021年第1期。

② 郭若平《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省思》,《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2期。

效能,另一个面相——纪念日中民众的社会时间便必不可少,不能被忽视。然而,这样的针对性研究较为薄弱,至于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是如何转化为民众社会时间的研究依然阙如,隐约流露出来的深陷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阐释路径更是削弱了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价值,不可避免地遭遇研究困境。^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努力在研究中描述中共纪念史中社会层面的状况与面貌以突破困境,^②促使中共纪念史研究显现“社会时间”的曙光。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中共纪念史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剖析研究困境产生的原因,并尝试寻求突破困境的研究路径,特别是注意思考如何呈现中共纪念史研究中被忽视的社会时间问题。

一、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盛

中共纪念史研究可追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清末民初,伴随着现代政治的生长,纪念政治逐渐兴起,纪念日的政治价值日益受到各方力量重视,不仅本土的传统性纪念日被赋予了新的政治诠释,域外的现代性纪念日也被引入,甚至属于本土政治力量的现代性纪念日也不断地被创设。身处其势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洞察到纪念日具有的特殊时间意涵,如李大钊不仅借助纪念日表达政治意愿,在1919年“双十”节之际发表文章表达对民国政治的失望之情,^③还希望借助纪念日发动民众,在1919年“五一”节纪念文章中普及“五一”节历史知识基础上指明其应有的政治意涵,意在引发中国工人纪念“五一”的热情,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④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基于政治引领和现实斗争的双重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纪念日的政治价值,在最大程度上开发和把握纪念日的政治价值,尤其注意研究纪念日的历史、功能和意义等问题,努力发挥纪念日在自身革命文化建立与传播以及社会动员过程中的重要功用,如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所具纪念价值的阐述。^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创办或编写的刊物杂志也尽显对纪念日的重视,刊发了不少关于纪念日的讲话、报告或材料,如1939年编印的《五月的延安》描述了延安机关和民众在五月纪念日中的活动情形,^⑥1949年编印的《纪念日资料》主要是对中共革命纪念日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叙述。^⑦此外,诸如国民党等其他政治势力基于对抗需求对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也有所分析和研究。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实则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先行者,虽然他们的研究并非纯粹学术意义上的思想认识,更多的是政治性阐释或宣传性叙事,但为后人开展中共纪念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史料。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囿于意识形态、史学观念等因素,学术界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战略的宏观阐释,很少注意纪念日的研究价值。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

① 参见凌承纬《记忆与历史: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新视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6期;袁超乘《“历史感”之失:一个中共纪念史编纂问题的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等等。

② 参见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周游《节庆、认同与动员: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庆纪念研究(1949—1956)》,《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4期;等等。

③ 李大钊《文治国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④ 李大钊《“五一”节(May Day)杂感》,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⑤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60页;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1—569页。

⑥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纂《五月的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⑦ 生活杂志社编《纪念日资料》,东北书店安东分店1949年版。

后,学术研究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学术界也意识到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中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相关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上此时国际史学研究中“文化转向”学术潮流的影响,学者们关注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研究多了起来,诸如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等纪念日的来历、纪念情形、政治意义的讨论和回忆性讲述多见诸报端。不过,此时期的研究尚算起步,并没有深入地开展学术化研究,真正进行学术化研究是21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念日在党和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使得纪念日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频率明显增强,围绕纪念日而生的纪念活动也渐趋社会化,纪念日的政治性与社会性趋于融合。与此同时,新文化史理论和多学科交叉方法的引入也让中共党史研究焕发生机,此前那些难入主流史学研究的诸如话语、节日、仪式、符号等历史“边角料”开始被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计划。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中,学者们日益重视纪念日的研究价值,特别是想借助于纪念活动透视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和制度策略,有意识地从纪念活动的历史场景出发,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分析纪念活动的形式、特征和趋势,以此发掘蕴含在纪念活动中的政治目标、价值追求和社会态度。陈金龙较早地开展此项研究,是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仅分类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日而产生的政治需求、纪念类型和活动形式,还审视了长时段内的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在梳理纪念活动的缘起、类型与方式的基础上,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中共建党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新中国国庆纪念等具体纪念节点,勾勒出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演进脉络,评估中国共产党纪念的政治效能,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研究话语和学术体系。^①如今,中共纪念史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日渐兴盛,展现良好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体量不断扩增,研究力量从少数知名学者扩展到数量较大的研究生群体,研究成果数量也不断上攀,从每年十余篇提高到百余篇。第二,研究对象不断拓展,从单个纪念日向多个纪念日扩展,尤其是从“三八”“五四”“七一”等热点纪念日向十月革命、马克思诞辰等非热点纪念日辐射。第三,研究层次不断深入,从片段性观察向整体性审视转变,从横纵分离发展为横纵结合,从勾勒纪念活动的演进脉络深化到分析纪念活动的元素组成,从探究纪念日的历史价值发展到提炼服务现实的资政价值。第四,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一方面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纪念日建构自身及国家政治文化的问题,聚焦于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围绕政治意涵、目标任务、价值功能、理论创新、历史记忆等问题,透视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和国家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②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纪念日传播政治文化的问题,分析纪念活动中的元素组成,主要表现为借助政治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解读节庆中的话语、符号、仪式等元素,观察中国共产党建构政治认同的权力技术。^③与此不同,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

①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参见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郭辉《习近平与新时代抗日战争纪念》,《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等等。

③ 参见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胡国胜《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王海洲《作为媒介景观的政治仪式:国庆阅兵(1949—2009)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宣朝庆、冯碧莹《时间标准与仪式化表征:新中国70年的节日变迁》,《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等等。

者们更多关注的是传统节庆形式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使用和变化、纪念日与旅游经济、节庆经济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学者进行了学科层面意义上的分析和讨论,对“什么是中共纪念史”“中共纪念史应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中共纪念史”等问题给予了概念界定、理论思考和学理省思,^①这无疑中共纪念史研究处于兴盛状态的直观反映之一。

中共纪念史研究同样得到海外学者的注意。一些海外学者擅长于理论建构,他们借助长期纪念研究所累积的理论阐释工具,如爱弥尔·涂尔干从宗教仪典出发提出纪念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思想,^②莫娜·奥祖夫从人类文化学角度揭示节庆对于集体行动和心态所产生影响力的观点,^③E. 霍布斯鲍姆从传统节庆演进的基本程序和外在仪式提出传统节庆演进动力源于现代政治力量的认识,^④法国皮埃尔·诺拉使用“记忆场域”的概念阐释节庆蕴藏的记忆塑造和政治象征的功能等,^⑤认知与诠释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日实现政治目标的方法和技术,逐渐形成了以理论建构为主,辅以具体案例的研究特点。比如,洪长泰以“二七”纪念日等为例分析了纪念活动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标,认为新生节日的创设是利用和改造传统节日的结果;^⑥日本学者丸田孝志可谓海外相关研究的代表,他不仅考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纪念日体系和纪念活动的情况,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活动中强调通过民众生活习惯展开政治宣传以实现群众动员的过程。^⑦近年来,海外学者着力于评论中国节庆现实问题,主要是透过具体案例阐述中国共产党借助节庆实施社会治理的过程,特别是不少学者评论了21世纪以来中国节庆与城乡经济、基础建设、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不少海外研究沿袭着西方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了西方价值观的政治倾向。

纪念日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对象,并成长为相对兴盛的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不仅证明了纪念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还阐释了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设的独特意义,无论对后续研究,还是对新时代纪念日运行与管理都具有重要启示。单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纪念日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显性文化现象,是人类维护、传承自身文化传统的重大创造,成为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方式和媒介”。^⑧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塑造自我标识的纪念日文化始终是中共政治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研究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功能和价值成为21世纪以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并渐趋形成了“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历史场景的再塑,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缘由、方式、类型、功能、规模、价值的考察,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等问题的研究热潮。^⑨应该说,中共纪念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共识已然形成。

① 参见郭若平《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省思》,《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2期;魏建克《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凌承纬《记忆与历史: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新视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6期;等等。

② 参见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参见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④ 参见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参见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⑥ 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⑦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

⑧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第381页。

⑨ 魏建克《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二、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欠缺

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总是要经历成长、省思和再成长的学术自觉,才能真正地独立并发展起来,中共纪念史研究亦不例外。因而,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其发展一帆风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共纪念史研究隐约流露出制约其进一步成长的某些欠缺。现在看来,最大欠缺或是愈来愈强调纪念日中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时间,采用“精英—权威”的话语体系,或从政治文化层面解读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日开展的政治运作,或从政党和政治建设层面讨论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国家发展层面上的政治意义,相对忽略了纪念日中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致使“群众—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中的行动反应、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纪念活动机制分析的理论探讨等问题的匮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日开展社会建设的政治思虑和历史经验,还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效能评估中更有说服力的“社会声音”,甚至带来了“同质化”现象,从而降低了中共纪念史的研究质量。

这种研究欠缺产生的根源大多是难以摆脱纪念日先天就是政治时间的理论预设。在现代政治舞台上,时间经常“被视作一种规训和控制的技术”,^①因而,“现代政权对节日工具特性的利用,要么通过创制新的节日庆典,并借助纪念仪式的操练,使之成为权威的标准形式;要么是向传统的节日投入新的象征资本,使得这些新旧节日逐渐政治意识形态化”。^②也就是说,纪念日虽然不是现代政治的专属,但在现代政治运行中获得了更为充足的成长力量,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性,特别是政党政治产生以来,国家现代政治走上了有别于传统政治的运行轨道,活跃于轨道之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重视纪念日具有的独特时间价值,不仅开发和利用传统政治中的纪念日资源,还引进或创设归属于自身政治的现代纪念日。因此,纪念日一旦生成,便无法脱离政治力量,难以从现代政治舞台抽身,只得将自身命运与政治力量紧密关联在一起。正是因为愈来愈多地认识到这一点,研究者无不尽力发掘纪念日包含的政治设计,充分展现纪念日中属于政治力量的政治时间,这同样影响到中共纪念史研究。

当然,这并非要否定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强调属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必要性和学术性。毕竟,纪念日始终处在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一伟大政治实践发展潮流之中,根本不可能脱离这个潮流,甚至可以说其所拥有的独特气息、色彩、力量和特征完全来自于这个潮流所供给的强大资源。换言之,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具有高度的同体性,这意味着我们既可以从纪念日中观察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发展进程、形势走向和基本规律,还可以从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透视纪念日的演进轨迹、阶段特征和前途命运。正如郭若平所言:“在中共纪念活动中,如何设立革命节日以及如何纪念革命节日,既反映了中国革命进程的特征,也折射出革命塑造民族性格的特征。”^③因而,强调纪念日中的政治时间就是呈现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色彩、特征和经验,而通过剖析纪念活动的话语、类型、表现、规模、氛围等层面的特定涵义来阐释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历史进程和政治意义,能够提供一种阐释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独特视角,所以这种研究不仅是有益的,还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关键构成。

① 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

②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③ 郭若平《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省思》,《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2期。

只不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深陷这一理论预设,总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权力技术展开,尽力发掘纪念日背负的政治功能,并且以此回应这种权力技术的效能。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一种恒稳的纪念状态、恒定的纪念效能和恒常的历史启示,在无形之中简单地线性化了中共纪念史的历史叙事,不仅不能真正地讨论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历史价值,还割裂了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无法切实探明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所以,在设计好的专属于特定纪念日的理论空间中,纪念活动包括的政治信息大多被揭示出来,却相对忽略了内中蕴藏的具有道德指向的社会信息,而这种信息恰是在暂时构建起来的纪念环境中政治观念与群众思想实现交融的关键所在。诚如杰伊·温特所言“在记忆之场举行的纪念活动,是一种因信念而生、由某个大型共同体所共享的行为。被纪念的那个时刻既具有重要意义,又包含着某种具有道德意味的信息。”^①显然,中国共产党营造出来的纪念日场景中,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身影,还有其他政治力量,更有社会民众。

难以避免的是,单纯地将纪念日视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表现的理论设计极易形成固化的研究路径。现在来看,这条路径主要表现为预设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理论前提,使用爬梳并归类党报党刊和纪念活动相关资料的研究方法,沿用“为何纪念—怎么纪念—纪念功能”的研究思路,以及力求“史论结合”,实则是“以论带史”的书写方式。因而,中共纪念史研究愈来愈呈现相似的研究框架和写作风格,这在初入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不得不说,这种研究路径实际上是给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纪念日贴上了身份标签,虽然能够广泛展现纪念日的政治本色,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的有效性,造成了研究内容的相似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纪念日中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的呈现与效果。

毕竟,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纪念政治本身并不只是展现自我形象和追求,还渴求纪念活动能够带来理想的社会效应,希望每次的纪念活动能够对群众的政治认知、内心体验和价值观念带来积极的影响,更乐意看到自身纪念日在乡村社会中的广泛认同。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在谈到纪念日期间政治宣传追求的目标时指出,宣传工作必须结合战争形势和具体环境提出基本任务与要求、具体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针,以利于向广大群众进行普遍而深入的宣传解释,不仅是要让群众了解“一般形势、实际战斗任务与具体行动方针”,还要让他们了解“一些革命真理”,因而,宣传工作不能“单纯地限制在应付某一临时事件或点缀革命纪念节”。^②话语之间流露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将纪念日视为自身的政治时间,还渴望借助纪念活动将其变为社会时间,促使群众感受到拥有自身节日的喜悦感,从而产生对纪念日串联起来的时间秩序的认同感。这并非一件遥不可及的政治奢望。如解放战争时期,七一纪念日备受解放区乡村社会民众的重视,“不只是中共传达自身宣传意图的政治时刻,还是群众借机表达对中共感情的社会时间”,最终成为“属于群众的‘感恩节’”。^③然而,中国共产党这种政治愿望很难在注重政治时间的理论设计和研究路径中被呈现,往往会受制于纪念日的政治性,忽略纪念日本身具有的社会性,致使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社会声音和民众感受的缺失,也无法看到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纪念日变为民众社会时间的内化过程,实难全面描绘中

① 杰伊·温特《记忆之场与战争阴影》,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

② 李大章《关于各地宣传工作的一些意见》,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③ 薛云、李军全《时间政治:中共革命纪念日体系的生成与演化(1921—1949)》,《南开史学》2021年第1期。

共纪念史演进的生存图景。

这种研究路径逐渐形成了一种狭窄的研究视野。中共纪念史研究应是扩展性的,而当前的研究视野收缩性明显,存在从内向外或者从外向内简单看待纪念日的线性思维,缺乏整体性关联,这主要体现在聚焦于单个纪念日的内部构成,借助文本资料深度发掘纪念话语、纪念活动、纪念符号,期以管窥纪念日背负的政治意图。这样的研究固然有价值,却也收紧了研究视野,无形之中将研究重心禁锢在纪念日本体上。实际上,纪念日内部构成中的诸要素是与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构建起来的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纪念日的前途命运就依赖于这个政治环境。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不同政治环境中,纪念活动中包含的话语、符号、仪式、装扮、游艺、集会等要素的象征寓意是不断变化的,所背负的政治任务也有所区别。比如,1949年在如何纪念“三八”妇女节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强调要结合地方革命形势发展确定纪念主题,明确要求:在“老区半老区”纪念内容主要是全面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落实好春耕计划,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模范,要求“每个有劳力的妇女至少学会一种生产技术”;在刚刚解放的“新区”,纪念内容主要是帮助提高妇女的阶级觉悟,动员妇女参加土改运动;而在敌人占据的“城市”,纪念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妇女解放政策,揭破敌人的欺骗宣传,并介绍妇女参政和参加生产的模范事迹,打破妇女依赖男子吃饭的寄生思想。^①显然,这种纪念主题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而产生不同纪念要求的结果。因而,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所处政治环境的这种联系提供了延伸纪念日研究边界的线索。然而,这样的线索却不断地消失在收缩性的研究视野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收缩性的研究视野难以摆脱党报党刊等文本资料所展现出来的史实表象的诠释框架,缺乏深度的意义诠释,所遵循的价值判断大同小异,更容易带来类似的意义评析,不仅无意之间拔高了纪念日的政治功能,使人产生“纪念日万能”的感觉,也显露出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处境变化之间的脱离,无法揭示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所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情况。自然,每个纪念日在收缩性研究视野下的理论支撑、叙事框架和书写话语基本相似,不同的唯有纪念日对象,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每个纪念日的特性,淡化了纪念日之间的差异性。

或许,这种研究欠缺是纪念日研究面临的共同困境。法国大革命节日研究专家莫娜·奥苏夫早就注意到这个困境,指出“史学家们只看到了节日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抹煞了节日活动所表现出的意义”,感觉到“节日被说成是服务于事业,随时可以装配和拆卸的易于处理的一台机器”。^②确实如此,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面前,只有纪念日的狭窄视野不仅让人产生将纪念日全部归之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设计的思想疑虑,削弱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也难以有力回答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效果的问题,自然也无力应付一些学者对中共纪念史研究价值的轻视、质疑或攻击,这成为中共纪念史研究的一大尴尬。

三、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突破

正是因为看到中共纪念史研究存在的某些欠缺,有些学者开始反思已有研究,针对理论方法、研

^① 《关于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指示》(1949年2月23日),河北省档案馆藏,资料号:224-1-60-3。

^② 莫娜·奥苏夫《法国大革命中的节日》,勒戈夫、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

究主题、研究视角等不足之处,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特别是倡导记忆史、概念史的介入,为弥补研究欠缺提供了理论启示。^①在笔者看来,中共纪念史研究实现突破的关键在于摆脱单一强调纪念日的政治性的理论预设,应该在呈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同时,加强纪念日的社会性研究,重视书写纪念日中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与融合状态,努力构建一个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与社会传统和力量之间内在互动的理论框架,以此跳出固有思维的束缚。

之所以强调纪念日中社会时间的呈现,首先在于纪念日作为一种特殊时间,本身就有时间的社会性特征。虽然社会科学界对于时间的概念界定颇有争论,但是几乎没人否定它的社会性,坚信“时间的根本性在于社会建构”这种认识在具有功能主义倾向的理论家那里显得更为突出,他们经常直言“时间总是社会时间”给出的理由是“时间反映、规范和安排着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反对这样的认识,同样认可社会性是时间的本质属性的观点,因而特别强调时间运行表达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②因而,纪念日既作为政治性时间存在和发展,也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甚至可以说它背后的政治力量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就是其从政治性完成社会性,最终内化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秩序。

当然,强调社会时间的呈现,绝不只是纪念日作为时间属性层面的内在要求,还是中国共产党运行纪念政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建立和稳固崭新社会秩序的实践表达。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纪念日的这种追求是与所处政治形势和力量强弱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借助于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政治形势,以及自身组织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力量发展,推动代表自身政治文化的纪念序列完成从政治性到社会性的任务目标。一般来说,这种任务目标的转化过程不仅涉及政治权力的形象表达、意图宣扬、合法性建立等政治性问题,还涉及社会时间的解构和重构、社会民众建立和延续新的时间秩序的观念和习惯等社会性问题。不过,在解读中共纪念史中政治时间向社会时间转化过程时,只是聚集于政治时间的解读难免会忽视社会时间的展现,遗忘民众对于中共纪念政治的思想认知和行动表现。比如,围绕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形成的心理记忆的解读。单从一个人的心理记忆层面上来理解的话,包括再现、庆祝、回忆、演讲等在内的纪念活动总是会提供一个形成共同心理记忆的社会场域,它构建起来的记忆时刻和空间氛围往往是政党精英和社会民众的理想、期望和情感的相互融合的复合体,也是政党记忆整合个人记忆,以形成集体性的社会记忆的理想载体。换言之,“记忆实践虽然是在无限大的背景中、通过各种多样的媒介而发生的,但它们往往既是个体性又是社会性的。”^③因而,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尝试唤起和再现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或形成新的社会的集体记忆,这是它最乐意看到的纪念效能。可是,集体记忆的激发远非只要付出政治努力就会有收获那样简单,它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深受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价值观念的影响,而最困难之处是容纳了不同生活背景的民众,他们有着复杂多样的行为举止、思想观念和信仰追求。所以,“跟个体的回忆一样,社会的回忆也需要动机和场合”,只有在特定的回忆场合之中,社会记忆才有可能生成“历时性社会认同”。^④倘若借助纪念活动而生成有所共鸣的心理记忆,以及实现纪念日所包

① 参见郭辉《纪念史与记忆史:一个学术关系问题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侯竹青《概念史视角下的中共纪念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3期;等等。

② 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金梦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③ 杰弗里·奥立克《从集体记忆到关于记忆实践和记忆产品的社会学》,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第196页。

④ 齐格弗里德·施密特《记忆和回忆:建构主义的路径》,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第244页。

含的政党记忆与民众记忆的融合,最终产生属于社会的集体记忆,关键之处在于构建属于不同纪念日属性的回忆场合,进而强调纪念活动中政治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对此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深有认知,从纪念活动设计开始便注意寻找沟通民众思想感情的融合点,特别是在拥有更高更强科技展演水准的时候。所以,如何揭示中国共产党克服现实困难以实现政党记忆向社会记忆转化的政治思虑和社会状况,应是中共纪念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研究者的眼光聚焦在政治时间上,虽然有利于揭示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也能够充分展现中共记忆的观察和描述,却不足以完整揭示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活动过程中追求的自身政治思想与社会民众观念的融合过程。

如果以百年视野审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基于中国共产党所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变化,纪念日包含的功能早已溢出纯粹的政治功能,因为通过它们,不仅需要建构与宣扬现代节庆秩序,还需要营造节庆文化空间,更需要应对节庆文化危机,逐渐成为具有复合功能的社会治理形式,依托其生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既包括党、政府、民众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角力形成的内部格局,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融合性、制度性形成的外部格局。这两种格局的交互作用不仅提供了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中国共产党运行纪念政治的途径和形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社会治理的迅捷性。因此,作为现代政治元素浓厚的纪念日,并非只是政治的附属物和传声筒,还与社会习惯存在着微妙关系,具有内在的社会属性,发挥着导引城乡社会秩序、构建社会文化网络的功用。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与城乡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当那些政治属性极强的纪念日被推入城乡社会的时候,其运行条件和情形如何,究竟遭遇多少社会障碍,与社会生活、群众观念的关系如何,是怎样与社会习俗、民众信仰相连接的,又是如何影响民众节庆生活秩序的,这些问题恰恰是对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效能的最佳阐释。因而,理论预设中要充分意识到纪念日作为社会时间的学理意义,强调从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发生的社会环境出发,将纪念日置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审视考察其具体实态,这既有益于挖掘纪念日背后的中共政治文化与城乡社会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和国家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

一旦理论预设有了社会时间的强调,中共纪念史研究的视野就会得到扩展,研究重心也会从纪念日本体上转移开来,改变只是关注纪念日内部结构的思路,并且不断地向外延伸,寻找围绕纪念日周围的外部环境,并发掘纪念日与其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从而生成一种新视野。通常而言,这种外部环境的主要结构包括寄托纪念日的事件环境、支撑纪念日的政治环境、烘托纪念日的社会环境,实则一个视野层级不断从微观到宏观的拓展过程。也就是说,将某个纪念日置于其赖以生存的事件环境中进行分析,只要能够查找到事件本身所在的特定政治环境,便能确定纪念日在这个政治环境中的位置,因为脱离了这种政治环境,事件回放也就丧失了纪念价值,同时因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会带来事件解读的变化。所以,将研究视野延伸至政治环境能够更好地观察到纪念日内部结构的构建与运行的历史意义。这种研究视野不会停止于此,因为为了便于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把握其运行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意义,依然需要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再度向外延伸至宏观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可以提供政治环境运行的基础性力量,所包含的是更为宽泛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特别是千丝万缕的社会文化观念,在这样宽泛的环境定义中理解纪念日的目标和意义更具有说服力。而这一切基于纪念日而来的探索和思考,不仅提升了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甚至可以提供中国共产党奋

斗史的另一阐释路径。在这里,以纪念仪式为例作个说明。

仪式是中共纪念活动中较为常见的关键环节。对于仪式的理解,研究者往往侧重于讨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纪念仪式建构起政治秩序,以及塑造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强调的是纪念仪式塑造社会民众的单向作用,而较少注意到社会民众对于这种仪式的政治理解 and 行为自觉,以及纪念仪式中政治意愿和社会情绪之间的互动融合。这种理解当然有助于揭示仪式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政治环境的作用,然而,这绝非仪式的全部,因为仪式还包含更重要的社会性。对于仪式的这种诠释,大卫·科泽有所警觉,指出大多数研究总是在强调一个观点“仪式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都很重要”,因而他特别反对“政治仪式只是用于服务现状”的诠释,认为“政治仪式对政治的重要性要远胜于此”。^① 确实如此,纪念仪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沟通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核心渠道,并非都是政治环境的纯粹造影,其特有的场景设置与程式操演对于在特定的纪念空间中形成充分的社会功能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比如,从抗战后期开始,毛泽东肖像作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象征被各级组织推广使用,特别是运用于集体性的纪念仪式,寓意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② 然而,对大多数社会民众而言,这种寓意恐怕并不深刻,他们的意识中大多是因现实生活需求无法满足而衍生出来的敬奉现象,此时大型纪念活动推崇毛泽东像的悬挂和使用也助推了这样心理意识的生长。^③ 所以,毛泽东肖像在纪念仪式中从政治性到社会性的转变,虽然离不开合法性塑造的政治努力,但是更与传统社会心理密不可分。因而,讨论纪念仪式中的领袖像使用问题既要观察政治意愿,还要分析社会传统,更要洞悉社会心理。

可见,我们应该站在更为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共纪念史,摆脱只是聚焦在因事件或人物而生的纪念活动的片段性的微观考察,而应提出从社会环境出发的宏观性思考,以此带来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所以,研究者有必要发掘社会环境对于纪念日的稳定性影响,观察革命战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同时期社会环境给予纪念日影响的变化,特别是观察纪念日受到社会环境刺激之后的反应或变化,观察所产生的新的信息,以及所产生的冲突性影响,更有必要发掘社会环境变化对于纪念日所带来的变动性影响。比如,在物质富足社会环境中的纪念大会,相较于纪念大会的政治影响,放假而带来的休闲娱乐更能够刺激社会民众的精神细胞。所以,民众往往有些厌倦纪念记忆的重复和叠加,他们真正在意的并不是有规律地纪念时刻,而是纪念时刻带来的物质享受、精神放松或经济收益。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够影响纪念大会运行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发生,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研究内容。如此研究,不仅能够扩张纪念日研究的内容,还能够增强纪念日研究的层次感。

发掘纪念日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才是实现研究突破的关键所在。因为一旦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研究的层次性,就会注意到纪念日绝非像表面上所呈现的纪念活动那样统一,实则围绕它还存有诸多与其并不统一的状况或因素,这些不统一的因素既包括与纪念日相抵牾的社会习惯、观念和行为,以及并不相称的社会记忆或叙事体系。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中政治目标的实现,远非描述或者想象中的那样流畅,很多时候也承受着纪念效率不高的危险。比如,新中国成立前,纪念日倘要顺畅地融入乡村社

① 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② 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③ 薛云《华北解放区春节敬奉毛泽东现象述论》,《历史教学》2010年第14期。

会节庆的时间序列,获取类似民俗节日那样的待遇和地位,成为群众集体狂欢的社会时间,绝非易事。1949年垣曲县组织庆祝“四四”儿童节时,大多数儿童不知道“儿童节是怎么回事”,甚至连他们的老师也不了解儿童节的来由和纪念意义。^①在组织筹备“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的时候,青浦县三区也遇到这样的窘境,现场工作人员不知道“五四”的历史、纪念意义等基础性知识。^②除了不了解纪念日及其纪念意义,乡村群众还经常受制于农忙、天气等客观因素而无法参加纪念活动。1949年尚和县各区组织“七七”纪念大会,由于群众忙着点种,致使部分纪念大会无法召开,还有个别地方“应付了事”,流于形式。^③蒲县青年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五四纪念大会也是因为农忙而无法组织农村青年参会,结果全区只有72个农村青年参会,只占应参会人数的5%。^④因而,揭示社会环境中制约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运行的障碍因素,讨论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对城乡社会的真正影响力,特别是表达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动关系,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运行中城乡社会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规范,这是中共纪念史研究无法也不能忽略的关键内容。

结 语

一般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纪念时刻既是属于自身的政治时间,又是属于群众的社会时间。不过,囿于纪念日作为政治时间的理论预设,中共纪念史研究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隐隐地流露出某些欠缺,特别是单一展现纪念日中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时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了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的一面,从而无法完整地呈现中共纪念史的历史面相。因而,发掘中共纪念史中的社会时间,并重视呈现纪念日场景中政治时间和社会时间的互动关系,将是一条弥补研究欠缺的有效路径。这条路径的最大优势在于将改变以往总是将纪念日单纯视为事件回放或政治表演,阐释纪念日的语境深陷于该事件所生成政治环境的状况,以及考虑分析事件或人物纪念的本真、内涵和功能的解读纪念日的思维结构;同时也会弱化文本书写上强烈的“精英—权威”话语色彩,强化经济社会条件、文化生活环境、社会民众的态度情感和行动反应,发掘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中被忽略的现代元素与社会习惯之间的内在张力,提供党、政府、民众和社会力量在纪念日中相互扶持和角力的历史景象,充分呈现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日进行社会建设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体现出围绕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而生成的内外联动的历史本真,真正地把社会环境带进中共纪念史研究中,从而实现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知识重构”。如此一来,中共纪念史研究在实现提升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能够回答好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效能这个难题。

(作者李军全,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邮编:225009)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垣曲县纪念“四四”儿童节总结》(1949年),山西省档案馆藏,资料号:A176-01-37-02。

② 《关于“五四”青年节纪念报告》(1949年),山西省档案馆藏,资料号:A170-01-22-02。

③ 《尚和县纪念“七一”“七七”会议总结报告》(1949年),河南省档案馆藏,资料号:G7-12-1285-2。

④ 《关于“五四”青年节纪念报告》(1949年),山西省档案馆藏,资料号:A170-01-22-02。

On th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Yuanyou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 Yongcheng*

The uniqu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s often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political , intellectual and eve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a specific era. It is also shap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real politics , intellectual ideas ,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of the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Yuanyo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the unique political situation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y official and private historians alike. Not only did they inherit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from the Ren-Zong period , but also they promoted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scholarly interest. Furthermore , numerous bureaucratic literati chronicled historical records for pragmatic purposes , as a way to consolidate their social network. It strengthened the functionality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Hence , the clim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Yuanyou period was no doubt a consequence of blended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 academia ,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 leaving a lasting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Historical Writings on the Han-Song Regim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 *Zhou Zhongliang*

The early Ming government concealed Zhu Yuanzhang 's claim of vassalage to the Han-Song regime and attempted to suppress the social memory of this event. They also depreciated the status of the Han-Song in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The official record in *Xu Zizhi Tongjian Gangmu* during the Chinghua period treated the Han-Song regime with higher status for the purpose to downgrade the orthodox status of the Yuan dynasty. By the mid-and-late Ming period , private historiography began to focus on the Han-Song regime due to the resurgence of Longfeng documents. Historians differed in their views on whether Zhu Yuanzhang once adopted the Longfeng era name and received official titles designated by the Han-Song regime. Most mid-and-late Ming historians acknowledged the Han-Song 's achievements against the Yuan court but defended Zhu Yuanzhang 's reputation by praising his loyalty and denying Han Lin 'er 's status as a monarch.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Han-Song regime wa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official manipulation of memory , loosening of imperial control , and tensions in Mongolian-Han Chinese relations , which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ancient Chinese orthodox views.

A Refutation of the “Xia Dynasty Skepticism”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 *Wang Qi*

There has not been a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whether the Xia was a historic dynasty. Scholars cannot even agree on whether it ever exist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the “Xia Dynasty Skepticism” has undergone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questioning the credibil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dynasty to doubting its very existence. Gu Jiegang was a key figure. Chen Mengjia and Yang Kuan invented the “Xia Dynasty Denial Theory” , and Sarah Allan further developed it into the “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But these views are either lack of solid historical support or logical contradictions. They cannot prove that the Xia dynasty did not exist. Moreover , newly emerg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nce again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proving that it was not a dynasty forged by the Zhou people.

Rethinking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s in Studies of the Commemorativ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Li Junquan*

As a subject of scholarly inquiry , studies of the commemorative history of the CPC have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 scholars still face challenges due to limitations of som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Some of them seem to overstress the political nature for commemoration days for the Party , underestimat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ociality for the people. Therefore , it will be an effective way to bring back the social time to studies of this topic. In other words , to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 scholars nee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commemoration days from political time to public social time in their studies. They need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rational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s social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the celebration of commemorative day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presents the ideological cognitions , political attitudes , public emotions and actions of the public in commemorative politics. It restores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mutual support and struggle among the Party , the government , the people , and various social forces on commemorative days.